

論 点 摘 編

70年来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创新

朱文伟,侯远长在《中州学刊》2019年第9期撰文指出,70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极大地发展创新了社会主义理论。70年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创新集中体现在: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按劳分配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总体布局理论、发展战略理论;创新发展了时代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理论、执政党的建设理论,提出了“四个全面”理论;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思想;对有关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理论、走和平发展道路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农村教育:经验、问题与对策

李松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是中国农村教育由“数量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70年,也是农村教育事业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政策杠杆作用充分发挥的70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奠基发轫时期(1949-1976年)、改革发展时期(1997-2000年)、转型深化时期(2001-至今)。形成了宝贵的经验:坚持党对农村教育事业的领导,把握好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把握好教育优先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服务三农”的政策导向,把握好农村教育的发展路向。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农村教育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任重道远,乡村义务教育质量提升空间亟待拓宽,农村社会成员教育观念尚需转变更新。总结经验,正视问题,展望未来,中国农村教育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布局和教育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必须要贯彻教育公平理念,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重构农村教育功能,树立农村教育自信;鼓励教育主体创新,不断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推动教育统筹规划,转变乡村群众教育观念;优化教育治理模式,破解弱势学生教育问题。

共享发展的人学意蕴

邵发军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人的共生性关系的形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初性逻辑基点,而基于社会共生性关系的本体论承诺所考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偏害共生与偏利共生而引致互利共生并走向人类所期望的和谐共生。在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支援性背景中对共享发展的出场语境做历史性的批判考察,可以揭示出共享发展的共生性关系的“脱域性”、发展序列的逻辑性、发展主体的超越性发展、层次的层级性及其发展意义的世界性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阈下共享发展具有非常深厚的人学意蕴,主要表现为:共享发展体现了共生性主体的本质要求,构建了共生性主体自由能力的基础性条件,引领共生性主体价值的实现,为共生性主体的全面发展提供正义性保障。

知情权与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冲突及消解

马明华,龚赛红在《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撰文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已

经成为信息社会,人类活动也更加依赖各种资讯和信息,每个人都力求获得更多的信息确保自己能以最“精准”“适当”地方式达到目的,但同时又力图避免自身的信息被搜集、保存、传播,为他人所用,以免危及自身的安全。因公共行政的性质特点,政府掌握了最大规模的信息,拥有最大的“数据库”,对这些信息的公开与保密,关涉到透明行政和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关涉到国家秘密和公共利益,故而知情权与公民个人信息权的冲突,应坚持基本权利优先于普通权利原则、公共利益至上原则、比例原则。

中国语境下中央权威构建的内涵与逻辑缘起

王崇在《理论月刊》2019年第7期撰文指出,在中国语境下,理解中央权威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及其发展的关键词。中央权威构建直接影响权威主体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基于中国语境,中央权威主要指执政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其概念内涵并不等同于西方价值偏见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也不等价于新权威主义,更不等同于“文革”时期的政治权威。中央权威构建意指增进政治共同体内部全体成员对党中央的自觉服从和自愿认同,同时使得中央在与地方互动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即中央能够说话算数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其构建逻辑缘起于中国国家结构、历史与现实三个关键维度: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大一统的历史观念与政治形态、后发国家有效应对整合危机、认同危机、分配危机等一系列政治发展危机的迫切要求。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 制度化路径

岳红举,王雪蕊在《财经科学》2019年第7期撰文指出,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关键,在于将现行财政治理中注入法治精神与制度保障,以缓解单一制超大型国家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之间的抵牾。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化存在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明晰现行

事权与支出责任调整的现状及其存在的困境,理解我国财政治理对于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制度依赖;二是理顺事权、支出责任与财权、财力等要素在财税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匹配逻辑,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走向做出合理判断。我国现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缺乏稳定性、确定性、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呼应性、动态性,这既源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也源于执政党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认知的逐步深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仅追求平衡协调的财政关系格局,而且服务于政府与市场的重新定位。其中,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厘清是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逻辑起点,而事权与各级政府的财政汲取权力、能力密切相关,决定支出责任的保障程度。事权划分不是简单地细化法定职权条款,其具有与各层级政府的财权、财力、支出责任保持预算平衡的动态意义。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载体,现代财政只有在妥善处理好市场体制中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交叉关系后,才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只有在妥善处理好事权动态化难题后,才能促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规范化、制度化。

我国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的三维建构

王莉在《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撰文指出,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是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当前的评价指标体系产生了企业环保信用等同于守法的悖论,不能有效度量、客观表征企业环保信用的全貌。信用管理学中的信用三维度理论中以道德文化理念等主观意识为内容的诚信度指标存在度量不能的困境。作为软法规范的企业环保社会责任与诚信度之软约束相耦合、环保社会责任兼具表征诚信度之外观和涵盖诚信度之实质,表达了企业环保社会责任表征诚信度指标的可能性。企业环保评价指标体系的改造可围绕诚信度、合规度和践约度三维展开,重点是将企业环保社会责任纳入诚信度指标体系,以环境违法行为处理结果信息重组合规度指标,同时扩大践约度指标体系的张力范围。

冯友兰的中国文化观

刘素娟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面对中西文化矛盾冲突,冯友兰以“旧邦新命”为己任,致力于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维护。在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文化生死存亡之际,他提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经验材料”的客观存在,理应被研究,不能被抛弃,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个体对世界文化有着特殊贡献。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化问题上,他以民族性的视角,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特性,是中华民族情感所系,中国文化蕴含着与西方哲学不同内容和特质的哲学内容。冯友兰始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问题,认为文化发展是一个历史延续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将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营养,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坚持抽象继承,探索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应该继承冯友兰的中国文化态度和精神,珍视中国文化遗产,努力发展中国文化。

空间视野下我国信息贫困的分布特征与政策启示

郑素侠,宋杨在《现代传播》2019年第7期撰文指出,作为伴随信息革命和信息化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贫困现象,信息贫困与物质贫困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成为我国当前反贫困行动的巨大阻碍。信息贫困与物质贫困在空间分布规律上呈现一致性,主要分布在西部、中部省份,且在类型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接入层面的信息贫困基本解决,应用层面的信息贫困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应将信息扶贫与经济扶贫有机结合,针对各省份、各地区信息贫困类型的不同,制定差异化、有重点的信息扶贫干预政策,开展信息贫困空间地图的绘制工作,为信息贫困的精准识别和分类施策提供决策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技术

陈杰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话语权是现代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和具体表征。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权包含话语权势、话语权利、话语权力和话语权效等四个层面,它们分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的前提与基础、核心与关键、手段与要求、目标与宗旨。从理论上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生成源于一套生产技术、系统符号技术、权力技术、自我技术的复杂的实践行为,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和技术路径,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一种话语呈现与话语实践。

道德同一性建构与青少年道德信仰生成

魏雷东,李然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撰文指出,青少年期是道德同一性发展的关键阶段。道德同一性是基于道德信仰和道德人格而提出的一种道德自我认知图式,作为个人同一性与社会同一性的联通管道和连结纽带,是青少年发展任务和自我同一性的核心议题。在青少年的发展任务中,道德信仰和自我同一性方面的问题往往会如影随形、纠缠不清,这也正是青少年道德同一性出现危机的根源所在。青少年道德信仰生成需要围绕道德同一性的自我确认、自我整合、自我定向与自我生成展开,在道德自我认同和道德理想超越中,寻求一种道德自我的一致性和连续感。

舆论史:中国历史场景中的公众意见与政治秩序

展龙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舆论形态变动不居,渐趋繁复。远古时期,舆论形态表现为简单的民意;至奴隶社会,古代先民逐渐摆脱神话传说的束缚,自觉寻求趋近理性的舆论途径以申述意愿,抒发情怀。至帝制时代,舆论的绝对专制性长期是社会舆论的主调,它通过严密的舆论管理制度将民间舆论逼入暗流,甚而妄加摧抑,但纵然如此,由知识精英主导的民间舆论依然针对突发性、争议性、刺激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集体意见,形成一股与官方舆论有别甚至对抗的舆论势力。正因如此,即使在专制时代,略具“民主”色彩的社会舆论仍然发挥了监督行政、修正政令、规范道德、淳化风气、引领风尚等重要社会作用。